

福州工商史料

第一辑

中国民主建国会福州市委员会
福州市工商业联合会 编

前 言

中国民主建国会福州市委员会、福州市工商业联合会（以下简称两会），在市政协文史工作委员会指导下，六十年代曾发动两会成员及所联系的人士撰写亲身经历的史料，收集成卷，正待出刊，由于十年动乱，而告中辍，且文稿略有散佚，深感惋惜。近按全国政协第四次文史工作会议精神，为推动和保存撰写上述史料，可供研究工商史和企业经营管理参考需要，进一步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特将前所征集史料加以整理，选出若干篇汇合新近征集文稿，汇编成辑，作为《福州工商史料》第一辑（内部发行）。

本辑内容包括行业史，企业史，名牌土特产品以及传统技艺，帝国主义经济侵略见闻及有关的片段史料等，计二十篇，作者多属耄耋之年亲身经历回忆的第一手资料，有的辞世手稿遗作，应视为“珍贵文物”传之后代。因此，征集工作，刻不容缓，及时“抢救”，实为当务之急。

今后将进一步贯彻“博采广征”，“存真求实”的方针，积极开展工商史料的征集，整理，调查研究，及时选编，陆续分辑出刊。并恳切希望两会成员及有关人士积极撰写，踊跃投稿。

限于人手不足和编者水平，刊出史料错误、遗漏之处在所难免。诚挚欢迎读者提出意见，以便订正补充。

中国民主建国会福州市委员会
福州市工商业联合会

一九八四年五月

目 录

福州商会发行辅币流通券终始	蔡友兰 (1)
回忆抗日战争中福州再度沦陷时的一桩“怪事”	蔡友兰 (9)
蜚声中外脱胎漆器沈绍安企业史	福州市工商联 (12)
行销东南全能的福州建华火柴厂	李希莱 郭云展 叶一俊 陈鸿鏗 (29)
福州澡堂行业史话	陈扬奎 陈杰生 林学兴 (39)
福州赛园橄榄发展概况	福州市工商联 (51)
福州名牌角梳李厚记角梳店兴衰史略	李森钧 (56)
福州名牌皮枕陈永盛皮枕店企业简史	陈秉毅 (66)
福州百龄行百货商店企业史	陈承椿 (75)
誉称福州唯一机器厂的广福利机器厂史略	薛玉官 张则金 林捷孝 (88)
福州报关行纪略	王阳怡 林永灿 (96)
福州的纸笋溪行	高景星 (109)
福州的钱庄	陈梓端 黄观云 (119)
东南银行的前前后后	陈步伊 (127)
台伏票两件事	黄观云 (135)
重洋侨汇话当年	黄鹿谷 (142)
昙花一现的福州特殊行业——“发票行”	黄家铨 (146)
福州的驳船	林永灿 王阳怡 (150)
福州英商卜内门公司	余德舜 王东之等 (161)
英商颐中公司剪影	黄鹿谷 (173)

福州商会发行辅币流通券终始

蔡友兰

抗战胜利后，苦难的中国人民从日军铁蹄的蹂躏下解救出来，人民渴望和平生活，重建家园。国民党不顾广大人民的愿望，挑起内战。它为了维持其军政开支费用，滥发纸币，使全国市场为伪钞所充斥，币值一日数度贬值，商家早上售出货物，到午后不能同等数量购入，因而相率闭门，以保存实物，无形等于罢市，人民生活几陷于绝境。

1949年春，本市市场混乱，怨声载道，商店为保存实物，已非闭门歇业不可。时我负责本市商会，自不能袖手旁观，置若罔闻。自思要使市场恢复安定，必须稳定币值。遂初步设想以银元为本位的辅币流通券，由市商会发行代替伪钞，小商及农村供应的蔬菜、水产品等无币值变动之顾虑，自必竞相营业，则恢复市场繁荣与安定人民生活，只在指顾间。主意已定，即召集本市各主要同业公会如银钱业、京果业、棉布业、百货业等负责人开会。告以：“目前市场局面极度混乱，使市民维持最低生活的物资渐趋断绝。本市为万商云集之地，各商均组织同业公会，市商会为各同业公会选举成立，是全市商家领导机构，若不急筹营救，不独市民日常生活陷于绝境，影响所及，社会治安秩序也将发生问题，市商会亦难辞其咎。亟须未雨绸缪，预防后患。我本人初步拟定由市商会发行以银元为本位的辅币流通券流通市面，使币值稳定，商家可以照常营业”。首先发言同意者为银钱业同

业公会理事长陈梓藩，他自请以主持银钱业业务兼发行台伏票之经验，对发行辅币流通券方面，尽管窥之见，在市商会领导下，负责计划发行。其他各同业公会代表相继表示拥护。最后我请各商家在辅币流通券未发行前，对市场另售供应物品照常供应，以安定市民生活。虽受损失，待发行辅币流通券后，当可得到补偿。次日商会门前人马麋集，皆为查询此事而来，他们交口称颂，使我感愧。至筹备发行辅币流通券事，只邀集主要的同业公会负责人磋商。初议只发行五十万元流通市面，我以福州是本省各地农、商云集之地，为各种产品的集散地，辅币流通券发行后，福州附近各县得此佳讯，为免伪币贬值之害，又将各该县的山、海农产品畅运到福州交流贸易，区区五十万之数，实难胜通货之任。应准备发行一百万元以资周转。出席的各同业公会负责人均表同意，遂通过发行一百万元。至印发辅币流通券问题，从前本市以百城印务局技术最精良。抗战时迁往南平，后增加设备承印国营银行的钞票，抗战胜利后迁往台湾，应另觅一家技术精良者承印。在商议间，适本市参议院院长史家麟老先生到会查询昨日市商会讨论发行辅币流通券事，并谓此事在目前形势下乃良谋善策，应争取时间早日发行。众告以正在寻求一家印刷厂承印辅币流通券，即承史家麟先生指示说：现在国民党中央政府对发行钞票权均收回，只由国营银行即中国、中央、交通、农业这四家银行发行。其他如地方银行及私营银行概不准发行。福建省银行是地方银行，只能发行辅币券一角至十角券，现已印好未敢发行，因伪币不断贬值，地方辅币券亦同等贬值，等于废纸而已，所以封存未动。可向省银行商量，将该辅币券移交市商会发行，有现成的辅币券，不至浪费印刷时间，接过来马上就可发行流通市面，使岌岌可危的市场立可安定。此议深得市商会同人之赞许。即请史家麟前往省银行商量。时福建省银行同仁得悉市商会筹议

发行以银元为本位的辅币流通券流通市面，亦认为妥善。适史家麟接踵来协商，虽则省银行经理许显时在香港，业务由付经理或其他负责人代理（我已记不清），但对史家麟建议，原则上绝对同意，并表示在转让辅币券与保管基金方面，须事先熟谋研究周全。省行认为，它印便的辅币券移让市商会发行，应由市商会通告，并担保十足兑现；至市商会辅币券发行处仍宜设省银行，由省银行派熟悉人员帮助发行，市商会可派员监督。对收回基金，由省银行拨出专用仓库由市商会派人保管。史家麟即将此佳音向市商会转达。此时市商会的会议尚未散会，对省银行如此迅速帮助市商会发行辅币券，关心地方社会秩序和人民生活，不作权利和义务之争，深表满意。

市商会的通告，略谓：“省银行预备的辅币券，现在让归市商会发行。该辅币以银元为本位行使市面，使一般小商贩免受币制贬值影响，得以保本保值，稳定物价，安定人民生活，市商会担保十足兑现”等语。但在拟稿之际，大家又顾虑到当时江西、浙江两省已次第解放，国民党残兵败卒溃退至闽北以至水口以下者日多，如见市商会有此一笔基金，向市商会提出借饷要求，将如何对付，事先必须筹谋良策。我认为此时是朱绍良任国民党福建省主席兼绥靖主任，军政大权概由他掌握，抗日时他是某战区司令长官，在国民党军队中负有盛望，且朱氏是浙江原籍，生长在福州，对地方情形明若指掌，如得悉市商会为安定社会秩序，稳定市场物价，当可同意保证基金安全。可请萨镇冰老前辈向朱氏表达市商会发行辅币的意义。为保基金安全，请其支持。此议得到与会各代表同意，推举我与萨老接谈。至与省银行作最后定论之代表，则推陈梓藩、卢仲礼两位常务理事前往。是日之会自早晨八时到下午十一时才散。次日陈、卢二人前往省银行，先致感谢之意，再告以市商会通告公布之后，辅币即可发行，对基金

专用仓库，请事先准备好。省银行表示要不分彼此，共同努力，可谓完满完成任务。我拜谒萨镇冰老先生具陈来意，萨老即命我共驱车前往省政府向朱绍良请求。朱绍良毫不犹豫的答应，并询我要用何种形式传达。我答以最简单、最快的方式，由市商会召集工商业者到市商会开会，欢迎朱省长到会训导，并宣布辅币券和基金由市商会保管，本省任何军政机关不得借词借贷，使全市商民周知。朱稍为酝酿一下，询我市商会何日开会，我答以救灾如救火，最好在明日即召开。朱亦爽然答允准次日午后二时到会。届时朱到会宣布市商会发行以银元为本位的辅币券，虽为临时之计，乃以安定市场与人民生活，该辅币券并基金由市商会负责保管，凡军政机关不得假借任何名义向市商会勒借，市商会内的监理事和商家等亦不得挪用分文，我随时派员审查核算等语。全体与会者均鼓掌欢迎。按兹事重大，由建议发行到朱绍良到会宣布，只花了四天时间，即告成功，其处理之迅速利落，均属前所未有的。

至第四天市商会发出通告后，全市商家及小商贩皆携银元到省行兑换辅币券为找另之用，分票系用铜片，每角兑铜片十枚。此铜片是向闽东收购而来的。第一天来兑换辅币券者，已收银元一万余元，发行两个月后，发行量达八十余万元。此时市面安定繁荣，不受伪币充斥之害，所有贸易一如往常。全市人民安心等待欢迎解放。

时国民党已濒灭亡前夕，而军政费用，台湾仍是按月发放，因银元不足，以黄金凑数。福建绥靖公署收到的黄金，以每两折价银元五十元，持向福建省银行抵押银元补发军政费用。福建省银行亦缺银元，遂以抵押辅币券之基金。此时市面黄金已涨至每两折合银元一百五十元之数，所以我们即予接受（折银元五十元）。

国民党军队败窜到闽口见增多。某师要建筑防御工事，向市商会商量筹助黄金三千两。我答以市面凋零，无能为力；他要我勉力筹助，保护地方安全，限数天后答复。我将此情报告朱绍良，承其指示可极力挡住，如有事他可负责。故以后数次催筹，仍以无力筹付了之。一直拖到福州解放前二十几天，改为要求砖头五万块。我察形省势，只好允诺，以四百银元购买五万块砖，待砖运到并未运往使用。只隔一星期福州便告解放，以后这批砖由市消防队用以盖造消防车间。

回忆在抗日战争中，地方上损失固难以估计，但抗战胜利之初，民间财富尚保存大部。传闻国民党中央国库尚有预备金五亿多美元，在1947年国民党所发行的纸币尚未等于废纸前，即行改革发行金元券，以银元一元兑换金元券二元，以金元券六元兑换美元一元。在金元券开始发行之日，上海市商民持黄金、银元向各银行兑换金元券者络绎不绝，争先恐后，以致排队兑换，兑换时间展至下午八时止，次日兑换情况踊跃如前。早报登载国民党财政部长王云五在上海打电话向蒋介石道喜，可见当时“国库”收进硬通货、黄金等不少。此时京、津、沪、汉工商业呈现新气象，其他各市、县亦有欣欣向荣之势。可是国民党坚持内战，内部各派系复争权夺利，日趋激烈。王云五无实权愤而辞职，蒋、宋、孔、陈等将国家财产转移至美国据为己有，致使金元券币价逐渐贬值，各地市场随之混乱。他们妄图挽救币制，又变相发行关金券。时东北及华北各省已相继解放，国民党人心已失，货币贬值如冰山之倾颓，人民生活，社会治安秩序均成问题，本市自难幸免。这时辅币券发行约已三个月，库存银元已达八十余万元，未见持券人来兑现，深得市民的信任和支持，并渐次扩大推行到福清、长乐、连江各县，市面交易如常，人民生活尚安定。

国民党政府逃往台湾后，两次寄来空白入境证明，要我举家

迁入台湾。我既考虑到家庭人口众多，在福州尚有财产、房屋不能抛弃；又考虑到市商会发行的辅币券，市商会担保十足兑现，我是市商会负责人；等于是我向市民担保，如果逃走，虽后继负责人，然在过渡期假如发生意料不到的市场变动，地方上必然归咎于我，我亦难辞其责，遂决定不走。可是我心里仍然忐忑不安，以为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我是资产阶级，位居福建省商会长和福州市商会长，是全省资产阶级代理人，不管有罪无罪，斗争对象我是最典型人物，何能摆脱。想到这里，心里实在惧怕。适老友庄宗周来对我解释说：所谓资产阶级是指官僚、军阀、大地主资产阶级，如一般工商业者都属于民族资产阶级，全国解放后共产党仍保护民族资产阶级，以利于发展国家经济，并指责我是杞人忧天。自得庄宗周先生启示后反躬自问，我虽是全省资产阶级代理人，但对社会救济事业如本省各县以及外省发生灾害时，与地方人士踊跃输将均名列前茅，并劝勉全市各同业慷慨解囊，此商人所尽知，总不能以资产阶级头衔，就不问其功过如何即绑上“断头台”，因而顾虑渐消。

在离福州解放约两个月时间中，虽地方秩序与市场稍定，有些商家见市区周围溃兵麇集，恐战事难免，时来探询我的去留意见。我乃以庄宗周先生的见解转告，并以建设复兴地方匹夫有责，不宜逃跑，国民党军队已无斗志，对战事不必顾虑。各商家认为我的分析精确，均以我的马首是瞻，并提出我倘有离开，须早日相告，俾得追随左右等语。在此两月中，市商会所发行的辅币券另星来兑取银元者至解放之日止，约在十几万元之间。

1949年8月16日上午，国民党福建省主席朱绍良电话约我到绥靖公署谈话。到时朱氏告我说：台湾新军在马江大获胜仗，商会应准备一些慰劳品，即开列一单约计一千元，我亦承诺下来。

辞出后便道去访国民党福州市长何震，告以此事。何告诫说，此事只可做准备，恐买好送去马江已无人接受矣。听下极为错愕，询何此话从何说起。何答道，现在局面已经大变，应相信他的话。所以对慰劳品亦不作准备。至下午三时左右，福建省绥靖署第四处处长徐达来市商会要提借黄金四千两。我告以市商会发行辅币券时，朱主席曾经到会宣布市商会为维持市面安定，临时发行辅币券，基金皆由商会保管，凡军政机关不得假借任何名义勒借，言犹在耳，今日何自食其言，容我面谒朱主席后再说。徐达不敢悍然硬要提借，只说待你去见朱主席后再谈也可，态度温和，殊不知朱氏已乘飞机逃跑了。

至下午五时后我返仓山家里，突接国民党福州市长何震电话，告知朱绍良已经逃跑，叫我坐镇市商会，对地方治安问题，得以时通消息商议。我返商会途次，一路尽是溃军撤退，拥挤塞道。眼见国民党军队已退走，解放军尚未进城，本市已成一座空城，无一军警维持治安秩序，万一发生抢劫等，则地方糜烂，何堪设想。在本市解放前数月，市商会曾成立防护团一百名，由海军借出枪械百支，子弹一万发。原预备在临解放时期内，作为维持地方治安秩序。防护团兵丁皆由本市三十七个救火会中抽调出来训练，才训练两个月为经费支绌，暂行解散，枪枝弹药由市商会保管。现为时间仓卒，来不及再从救火会抽调出来负责防护工作。即电何震市长，请其指令警察局将保安队约二百多人分布各扼要地区维持秩序。何以此时已无权指令，要我直接向警察局商议更好。我即向警察局商议，彼提出条件以粮饷由我负责即可听从调拨。处此千钧一发之际，只要能维持治安，任何苛刻条件都得答应。至晚十二时与警察局联系时，得悉解放军已进城，警察局枪械已被缴交。听此消息如释万斤重担，以治安秩序，可以高枕无忧了。次日，即八月十七日早晨五时，我即到市面察看市场情

况，见市面十分安宁，人人面呈喜色，农民供应蔬菜，水果小商贩照常买卖，甚至各机关职员仍是拿着皮包到原机关上班，到门口见是解放军站岗，始知本市昨夜已经解放了。本市市民及郊区农民在不知不觉中被解放出来，这主要是党的政策深得人心；但本市在解放前夕，既不受伪币贬值影响，又能安居乐业，这与市商会发行辅币券不无关系。

福州市商会为本市约七十个同业公会所组成，解放初期对支前工作是责无旁贷的，所做的工作自有功过，在这里恕不提及，但在市商会保管和处理辅币券基金方面，在这里要做一些交代。在本市解放后约十数天，市人民银行要来提取库存的银元和黄金。我告以此项基金是兑换辅币券所需，如人民银行要提取则须负兑换之责。人民银行方面提出，人民解放军未渡江前曾发出通告，凡国民党所发行的有价证券，人民政府概不负责。我答以此辅币券是地方发行的与国民党无干，发出若干辅币券，备有十足基金兑付，不少分文。如人民银行发出通告，辅币券可由人民银行兑现，当将库存之银元和黄金全数移交人民银行接管。约过十天，人民银行告知我说：市商会所发行的辅币券，可以由人民银行发出布告，由该行兑现。我说一见布告即当扫数移交。至移交时约有银元十几至二十万元，黄金四千五百两至五千两之间（详细数目已记不清）。以上是市商会为维持社会安定，免得农民和商家及地方上人民受伪币贬值之害，为地方保存一点元气所尽棉力。解放后未兑现的辅币券基金。亦已完全移交人民银行接收，市商会尽到有始有终之责，抚心自问，对地方农、商群众可告无罪。

回忆抗日战争中福州再度沦陷时 的一桩“怪事”

蔡友兰

在抗日战争期间，福州于1944年再度沦陷，当时我是福州商会会长，偕商会同事们退往南平，协助商家办理货物来往登记等工作。不旬日，竟发生了一桩由国民党政、宪、特头子及密特等相继利诱威胁，要我去福州当汉奸的“怪事”。现在记述如下：

一天，我在南平住处休息，国民党福建特务头子王调勋带着两个素不相识的汉子来找我，我对王稍事寒暄后，即查问这二人是谁？王答你可直接听他说就会明白。其中的一个汉子毫不掩饰的说：“我是福州日军方面派来的代表，因占领福州的日军鉴于海口封锁，交通运输断绝，福建地方土特产不能输出，而需要进口的棉布、百货及工业日用品也无法进口，使福州与内地的工商业几陷停顿，人民深感痛苦；所以拟在福州设立物资调节处，以活跃地方经济，请会长去福州担任调节处处长，所有应向国民党政府及第三战区联系备案等一切手续，概由日方负责办理完妥，你无须顾虑。至于你此次因福州沦陷，家中及店铺所蒙受的损失，已由日本军方调查估价约值黄金三千两，你如同意去福州任职，我们即可先将三千两黄金在南平交付”等语。我听后便严词拒绝说：“你们想以三千两黄金诱我丧失民族气节，去当汉奸遗臭万年，莫作此梦想。我虽受战火损失，但绝不贪此不义之财，甘清

贫以自守。”时王调勋在旁默不作声，即与日特相率辞去。

次日，突然接到国民党福建省主席刘建绪长途电话，要我去永安面谈。我一到永安，刘便邀我去吉山别墅用饭。刘询我在南平的情况，我答以商家来往的货物登记工作很顺利。刘又问有谁去找我没有，我即告以王调勋带同福州日军代表来利诱去福州当汉奸，我已断然拒绝的全部情况。他听后沉吟片刻道：“目前海口被日军封锁，本省土特产堆积如山，没有出路，农村经济陷于困境，而地方上所需棉布及日用工业品，亦无法进口，城乡均感困难，应想法活跃地方经济，藉纾民困，我认为此事可行。你如果怕冒汉奸的罪名，可由省政府直接委派你去福州任物资调节处长，再由省政府报请第三战区和中央政府备案，俟批复后由政府转一份交你保存，你就不怕将来负罪。”所说的理由与日特在南平所说如出一辙。我立即答道：“我一去福州，就是当了汉奸，如何洗刷得清，这决难从命”。刘建绪听后面有愠色，也不答话。我即进一步对他表态说：“主席如果一定要我去福州当汉奸，我愿在永安受押待罪”。他这时才破颜为笑说：“士各有志，不能相强”。听了此语，使我如释重负。因此心情十分舒畅，离吉山后，就在永安闲逛数天，才回南平。

回南平后的第二天，王调勋又带那两个日本特务来对我说：“如果你去福州当物资调节处处长有顾虑，可以改在政府所属地界的闽清口设处。福州方面先将棉布及民间需要的日用品运交后，再将土特产运去。双方交换物资，其价值按项结算付清，亦无经济责任”。我说：“若按一般商家业务来往，这样做法是公平的，但现在性质不同，情况就完全变了。我绝不能干丧失民族气节事，自甘堕落为汉奸，今后不要再来纠缠了”。王调勋与日特相顾失色而退。

我想此事应该可以结束了，不料只隔两天，国民党宪兵团也

来“劝驾”，并表示可以由宪兵团派遣一排宪兵去闽清口，以保护我的安全。我亦断然拒绝，并理直气壮地对他们说：“名誉重于生命，名誉无存生命虽保何用”。他们亦无言以对，只得罢休。鉴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并避“自炫”之嫌，此事我从未对人言及。

福州解放后，我蒙党的教育培植，参加福州市工商业联合会领导工作。当1950年福州进行反动党、团、特登记时，我虽无参加国民党党、团组织，但在福建省商会长和福州商会长任内，对国民党征税及有关经济等会议都有参加，是否也要去登记？心里决定不下，就趋谒请示福建省人民政府主席张鼎丞同志，承指示：

“我来福建，由浦城到建阳时，即查知你没有逃亡台湾，并在参加支前工作，做得很好。我也了解到你在福州第二次沦陷时，不顾威胁利诱，不当汉奸的事实，对你有较好印象。你能保持民族节操和爱国立场是很好的。人孰能无过，你以前曾参加过一些会议等错误，党是不会去计较的，你可以不必去声请登记”。我又问张主席如何对我从未外说的拒当汉奸一事知道得这样详尽？他笑着说：“我们党办事是认真的，你的历史，有的事可能一时你自己都会遗忘，但我们却记载得很详尽”。聆听之下，不但使我感激万分，对党的明察秋毫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更钦仰不已。

四十年过去了，往事如烟，唯此至今思之历历在目，记忆犹新。适逢征集工商文史资料，爰记之以应。盖一以见当年国民党地方政府抗日态度的一斑；一以表民族工商业者大多能保持中华民族的庄严与爱祖国的热忱。非敢以之沽名钓誉也。

蜚声中外脱胎漆器沈绍安企业史

中国漆器在世界上来说，创造最早，舜为皇帝时就伐木流漆制为食器，经过历代民间艺人丰富发展，到了魏晋六朝就有“夹纆”神象的创造，也有叫做“干漆造象”。中虚没有木胎，里为粗布，可以说在一千四百多年前民间艺人对于脱胎的技巧，就放出一枝嚆矢。可惜这些文物，随着历代动乱，没有很好地保管，流落市肆，变为商品，在中国看不到的“夹纆”制品，相反在美国费城大学博物馆，纽约美术馆，都陈列有中国“夹纆”的神象一尊。当然“夹纆”的制法、不是和现在漆器的制法相同，但总是中虚轻巧的东西。聪明的艺人虽然看不到实物，也在想象中去摸索探讨祖国先代艺人的创造技巧，把这些宝贵遗产发掘出来，而使它放出更大的光辉。

沈绍安创业的年代

沈绍安，根据《闽侯县志》的简短记载，“沈绍安漆器创自乾隆间。绍安字仲康始得秘传研究漆术，巧配颜色，创造了脱胎器具，工作精致”。沈绍安创业到现在究竟有多少岁月，外间和沈家后代传说不一：外间说有一百五十年，沈家后代说，有二百年。我们从沈家找出沈绍安木主实物内写：沈绍安生于乾隆丁亥年四月（1767年），卒于道光乙未年六月（1835年），1767年算到1962年只有195年，如果以沈绍安中年30岁以后创造脱胎漆器，到现在（1962年）将近160年的历史。

在清代封建王朝乾隆统治年代，农民起义反清斗争转入低潮，封建经济、文化、呈现了短暂的复苏和繁荣状态，粉饰着太平局面。内官的生活，穷奢极侈，罗置民间艺人为内廷供奉，专门替皇帝雕琢玩赏用具。当时福州寿山石刻名艺人杨璇、周尚钧等也都被征为皇帝御工。手工艺人，工艺美术品有着一条广阔的道路，对当时手工艺人来说，是起着鼓舞的作用。沈绍安是一个破落户官僚门第的子弟，厌读诗书，转为漆匠。有一天，沈到衙门里替官员修理金字横匾。看到匾额的字迹虽已斑驳不堪，可是里面是夏布裱成一层，仍然坚韧挺固；这使他领悟到脱胎漆器的制法，引起了浓郁的兴趣。遂邀请了刻塑艺人塑造几尊泥神象，外裱夏布，涂上漆地，干后挖去泥土，再行髹漆加工上色，经过这样不断地反复研究，创造了轻巧、美观、耐用的脱胎漆器。

沈绍安做漆匠时，就在本市双抛桥有个家店连在一起的沈绍安老铺子。过去除替人家加工并接受定货外，还制售一些小商品朱漆筷子、漆碗、神主之类的东西。现在创造了脱胎漆器，也不必另起炉灶，就利用这个漆铺的架子兼售起新产品——脱胎漆器。双抛桥这个地方紧邻“三坊”，所谓“三坊”：即文儒坊、衣锦坊、光禄坊三条街道，是当时“富贵人家”的住宅区。住的多是官僚、豪绅、地主阶级，对沈绍安初期业务的发展，也是具有有利的条件。脱胎漆器价格高贵，不是一般劳动人民所能购买，供销对象主要还是面向这些“富贵人家”。所以初期的产品，只适应官场应酬馈赠，女子出嫁妆奁专用的：茶箱、烟箱、首饰盒、提盒、观音佛像等。这些顾客对此瑰丽华贵的产品，只要能够称心满意，价格方面就不斤斤计较。沈绍安始创只此一家，自然是“奇货可居”，不是高价就不愿成交。我们曾经看到了沈家高挂一幅沈绍安的肖像图，图中绘着他手执钓竿，身穿棕衣，这幅图画虽然过一百多年，面部下巴有些损伤，但还可看出神采奕

奕，逍遥自得的图画像。据他后代说法是采取京剧里“八百载”的故事，对业务自比姜尚在渭水钓鱼，不事招徕，把顾客比做周文王，识货前来，“愿者上钩”之意。同时对技艺传之子孙，也寄有“八百载”盛兴不替的愿望。

技术保守与营业分散

沈绍安只有一个儿子沈初朱，衣钵相传，一家人集中生产经营，沈初朱也只有一个儿子沈作霖，同样的一脉相承。可是沈作霖娶妻纳妾，嫡出庶出，就有六个男孩子，摆在企业面前的问题，如果六房都学了艺，将来分散竞争，对于技术就不能保守，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就创下沈家自己独有的家规：一、技术方面：传内不传外，传长不传次，传男不传女，传嫡不传庶；二、财产方面，上代的动产不动产，只分给没有学艺的子孙，让他们转业安排生活；学技艺的后代，不但无继承上代物质财产的权利，同时还要负担上代欠人家的债务。（主要指原料未付款，向外透借周转金，顾客定货未交等债务）。因为学了技艺，祖宗已经给予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穷”的“金饭碗”。为了保守技术，巩固企业，沈家曾有过这样情况：

（1）坚持家规 在传长不传次的家规正在实施，事不凑巧，第五代长孙不生于长房，偏生在次房，这个在同辈序居长的沈正情，就以长孙的身份也要学艺，争取“金饭碗”。沈家为了防止“金饭碗”被击破，必须保守技术。要保守技术只有依赖家规，在这种情况下，沈正情的学艺就没有得到上代的支持，但也没有办法禁止他制造漆器；

（2）女大不嫁 在同辈序中居次，在长房中居长的沈正镐，被认为是正统，因为还是长房长孙，技艺承受较好，可是沈正镐男孩子却不愿意继承父业，出外去读书，沈正镐又顾虑到“金饭